

长三角地区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

嵇正龙 宋宇¹

【摘要】 扩容后的长三角区域,面临更高水平和更广区域一体化的挑战。不同于已有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产业转移和企业选址等影响市场一体化因素的研究,文章聚焦于长三角企业异地投资的动态行为与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区域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显著放大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以及二者交互项的增长效应;而中心城市群与外围城市群的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增长效应截然相反,表明存在虹吸现象,有可能加剧区域不平衡。据此,需要从完善市场一体化的企业动态内生机制、抑制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的替代效应、优化区域内城市群划分政策等三个方面,推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 企业异地投资 市场分割 市场一体化 增长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0.4;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21)03-0110-08

一、问题提出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2019年的正式出台,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正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一体化的推进能够进一步打破市场分割,实现市场整合,在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上优化资源配置。规划纲要扩容了长三角的空间范围,在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三地基础上,加入了安徽省全境,并划定了跨越三省一市的中心区城市群,在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范围区域平衡发展的挑战。

在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诸多因素中,企业是关键微观基础和驱动力之一,主导了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持续改善。企业通过在异地设立子公司或者入股当地公司的形式,突破市场的分割,产生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市场的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的整合,便利资源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和主体之间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长三角地区上市企业数量从2000年的260多家迅猛增加到2019年的1230多家,约占同期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制造业企业820多家,占比接近70%。母公司数量急剧扩张的同时,其子公司也遍地开花,地理空间分布也愈发广泛。截至2018年末,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在区域内设立的子公司达到了3300多家,表明长三角地区上市公司的异地投资是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渠道之一,为区域市场一体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长三角地区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提出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长三角区域内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促进还是抑制了经济增长?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等在异质性层面产生的增长效应呈现出何种分异特征?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基于长三角地区企业投资行为影响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经验分析,将市场一体化机理分析引向微观企业动态行为层面,拓展了企业动态理论和市场一体化的理论交叉。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基于市场绩效的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经济复杂度、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编号:19FJLB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和边疆地区规划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XJA790002)。

作者简介:嵇正龙,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宋宇,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710127)。

角,从不同层面比较分析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为从企业维度完善长三角一体化政策提供评价和决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

关于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的研究,涵盖了顶层制度设计、空间结构优化、区域合作和分工、交通基础设施等(李培鑫和张学良,2019;刘志彪和徐宁,2020;董洪朝和蒋伏心,2020)。更多的研究探讨长三角一体化对区域内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刘乃全和吴友,2017)、促进区域内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邓文博等,2019),以及影响区域内企业的出口效应(强永昌和杨航英,2020)等。已有研究基本都将区域一体化视为外生因素,事实上从内生性角度思考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早已在许多文献中出现(项松林,2015)。比如,全球范围内区域一体化的内生检测,预测准确率超过95%(Baier和Bergstrand,2004),说明区域一体化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最近越来越多的文献将研究引向微观层面,企业动态行为被看作市场一体化的关键内生驱动力之一。城乡产业一体化进程表现为企业区位选址过程(张子珍,2017),企业迁移到外围地区并不会减弱其与核心区企业的关联性发展(Murata和Thisse,2005)。嵇正龙和宋宇(2020)认为企业由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集聚促进了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民营经济对跨区域技术交流合作以及逐利性的需要,有力推动了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发展(李鲁,2019)。企业并购和大企业集团产业链协调作用,也可以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刘志彪和陈柳,2018)。而子公司的设立正是跨越市场分割壁垒的一个有效方法(曹春方等,2019)。贾佳和刘小元(2020)通过制造业上市公司新增异地子公司分析企业异地投资的独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张筱娟等(2019)则在分析了杭州制造业企业的迁移后提出企业迁移促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观点。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观点,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替代,通过内部的科层组织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但同时产生了组织成本。企业在权衡成本的过程中,往往采取异地投资决策,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突破空间限制,在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同时,促进了市场的一体化。

关于市场一体化的测度研究通常从对应的市场分割出发。Poncet(2003)在讨论中国市场分割问题时,采用7种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估计市场分割指数,认为市场分割与实际人均GDP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很显然,仅仅使用农产品价格指数测度市场分割,存在价格因素考察不全的问题(盛斌和毛其淋,2011)。陆铭和陈钊(2009)则应用宏观的邻省之间商品价格指数测度市场分割,得到了分割市场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的结论。以上相互对立的两个观点,应该是由于研究样本选择和时间段的设定导致的。已有研究基本覆盖了市场分割指数的估计及其影响分析,但是缺乏对市场一体化的空间距离因素的考察。空间距离因素主要体现在地理和经济两个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交通运输成本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提高,会强化市场的分割特征。区域经济学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会形成地区间的分割特征,阻碍地区间的一体化。因此,城市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和经济规模差异都会阻碍市场的一体化,强化市场分割。本文尝试在已有价格法的基础上,考虑将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两个因素融入进来,提出价格权重法测度市场分割程度。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第一,微观企业研究视角。现有文献大多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区域市场一体化,或者是企业本身的位置转移等影响,而本文将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形成的企业子公司的分布动态作为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力考察,反映了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更大跨度的资源整合。第二,提出市场分割指数测度的价格权重法。价格法是传统的市场分割指数算法中应用广泛的方法之一,但是缺乏对静态的地理空间距离和动态的经济规模差异的考虑,显然是不合适的。本文将地理因素和经济距离以权重形式引入价格法,修正了传统方法对距离因素考虑不全的缺陷,提出了价格权重法,以更为准确地测度市场分割指数,并用于后续的经验分析。

三、研究设计

本文选择扩容后的长三角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该地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数据测度企业异地投资,提出融合地理距离和经济规模差异的价格权重法,估计市场一体化指数,最后采用工具变量法做实证分析。在中国经济从传统的行政区驱动转向城市驱动的现实背景下,本文选择从城市层面构建面板数据集和模型。

1. 模型选择

模型设定经济增长指标为被解释变量,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引入城市的其他经济特征指标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城市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构造面板模型进行经验分析。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beta_0 + \beta_1 FI_{it} + \beta_2 MSI_{it} + \beta_3 (FI_{it} \times MSI_{it}) + BX_{it} + \eta_i + \mu_t + \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 i 和 t 分别为城市和年份; y_{it} 为经济增长指标; FI_{it} 为企业异地投资指数; MSI_{it} 为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 $FI_{it} \times MSI_{it}$ 为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的交互项; X_{it} 为城市经济控制变量集合; η_i 、 μ_t 和 ε_t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干扰项。

2. 指标设置

(1)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的常用测度指标为经济总产出、人均产出和增长率等。本文选择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g) 和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水平值 ($\ln gy$) 表征经济增长,前者用于基准估计,后者用于稳健性检验。

(2) 解释变量。

企业异地投资。曹春方等 (2015) 在研究市场分割与异地子公司分布关系时,应用上市公司在注册地省份之外设立子公司的数量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来测度子公司异地分布状况,拓展和丰富了企业投资分布的相关研究。对企业在异地设立子公司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分析,引发了后续应用子公司测度企业异地投资的讨论。其中,马光荣等 (2020) 在研究交通基础改善促进资本的区域内流动时,使用上市公司在异地城市设立子公司的数量表征企业异地投资的做法,为本文所借鉴。具体的做法:首先,按年筛选出上市公司在本地城市设立的所有子公司数据;然后,剔除母公司注册地为本地城市的子公司数据,得到了异地上市公司在本地城市设立的子公司数量。本文实证模型中使用异地上市公司在本地城市的子公司数量的对数 ($\ln fi$) 表征企业异地投资。

市场一体化。刘志彪和孔令池 (2019) 提出了从产业、市场、空间结构、经济结构等 10 个维度测度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方法,较为综合全面。但更多的研究使用市场分割指数估计市场一体化程度 (盛斌和毛其淋, 2011; 曹春方等, 2015; 董洪超和蒋伏心, 2020)。市场分割指数的测算主要有贸易法、生产法和价格法三种方法,其中价格法应用最为广泛。价格指数法的理论基础是一价定律,即市场完全整合的城市 i 和城市 j 之间不存在套利机会, $p_{ij} = p_i / p_j = 1$ 。如果考虑到运输成本,那么相对价格 p_{ij} 存在一定的波动区间。价格法又进一步分为产品价格指数法 (Poncet, 2003; 陆铭和陈钊, 2009; 盛斌和毛其淋, 2011; 董洪超和蒋伏心, 2020) 和市场价格总指数 (曹春方等, 2018; 刘志彪和孔令池, 2019) 两类方法。由于城市层面产品价格、消费价格指数、工资指数等数据统计不全,本文基于已有市场价格总指数法,并融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因素,提出了市场分割指数的新算法——价格权重法。

价格权重法的基本步骤:首先应用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构建城市间价格变动矩阵,再应用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分别构建距离矩阵,并做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求三个矩阵的哈达玛积 (Hadamard Product),最后按照城市,逐行求取非零值的方差,记为该城市的市场分割指数。

第一步,构建城市数据集。构造时间-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城市经纬度和城市经济规模的面板数据集,并设定:观测时长为 T 个周期;区域由 K 个城市组成;每个城市用 C 表示。

第二步, 建立城市间价格变动矩阵。设定所考察的城市为 i , 与之相联系的城市为 j , $i, j \in (1, K)$, 且 $i \neq j$ 。原始数据集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统计是环比数据, 因此采用价格比的对数一阶差分 ΔP_{ijt} 来表征相对价格, 为城市 i 与城市 j 的相对价格。

$$\Delta P_{ijt} = \ln(p_{it}/p_{jt}) - \ln(p_{i,t-1}/p_{j,t-1}) = \ln(p_{it}/p_{i,t-1}) - \ln(p_{jt}/p_{j,t-1}) \quad (5)$$

为消除地区顺序影响, 对上述相对价格取绝对值 $|\Delta P_{ijt}|$ 。

$$|\Delta P_{ijt}| = |\ln(p_{it}/p_{i,t-1}) - \ln(p_{jt}/p_{j,t-1})| \quad (6)$$

为消除特定的影响因素导致的不可加效应, 采用去均值法处理得到城市 i 的价格变动部分 δ_{ijt} , 由城市 i 相对价格绝对值

$|\Delta P_{ijt}|$ 减去所有地区相对价格的均值 $|\overline{\Delta P_{ijt}}|$ 得到 $K \times K$ 价格变动矩阵。

$$\delta_{ijt} = |\Delta P_{ijt}| - |\overline{\Delta P_{ijt}}| \quad (7)$$

$$\Phi_{pt} = \begin{vmatrix} & C_1 & C_2 & C_3 & \dots & C_K \\ C_1 & 0 & \delta_{12t} & \delta_{13t} & \dots & \delta_{1Kt} \\ C_2 & \delta_{21t} & 0 & \delta_{23t} & \dots & \delta_{2Kt} \\ C_3 & \delta_{31} & \delta_{32} & 0 & \dots & \delta_{3Kt}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0 & \dots \\ C_K & \delta_{K1t} & \delta_{K2t} & \delta_{K3t} & \dots & 0 \end{vmatrix} \quad (8)$$

第三步, 建立城市间地理距离矩阵。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冰山成本”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而冰山成本与运输距离正相关。也就是说, 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抑制了一体化, 正向影响市场分割指数。为了计算的简便, 本文设定城市间距离与城市的价格变动部分完全正相关。根据城市的市政府所在地的经纬度计算得到城市间距离 d_{ij} 。那么, 区域内 K 个城市间形成了对角线为 0 的 $K \times K$ 矩阵。

$$W_d = \begin{vmatrix} & C_1 & C_2 & C_3 & \dots & C_K \\ C_1 & 0 & d_{12} & d_{13} & \dots & d_{1K} \\ C_2 & d_{21} & 0 & d_{23} & \dots & d_{2K} \\ C_3 & d_{31} & d_{32} & 0 & \dots & d_{3K}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0 & \dots \\ C_K & d_{K1} & d_{K2} & d_{K3} & \dots & 0 \end{vmatrix} \quad (9)$$

第四步, 建立城市间经济距离矩阵。为弥补地理距离的静态性缺陷, 本文进一步引入具有动态性的经济距离。城市的经济规

模是城市之间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商务往来和产品流动,显然要比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更为频繁和紧密。那么,城市之间的差距越大,则会强化市场之间的分割特征。经济距离与地理距离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经济距离是动态的。本文的经济距离指标采用具有规模意义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总量指标计算得到,采用与前述地理距离矩阵构造类似的方法,得到对角线为 0 的 $K \times K$ 经济距离矩阵。

$$y_{ijt} = |Y_{it} - Y_{jt}| \quad (7)$$

$$W_{yt} = \begin{bmatrix} C_1 & C_2 & C_3 & \dots & C_K \\ C_1 & 0 & y_{12t} & y_{13t} & \dots & y_{1Kt} \\ C_2 & y_{21t} & 0 & y_{23t} & \dots & y_{2Kt} \\ C_3 & y_{31t} & y_{32t} & 0 & \dots & y_{3Kt}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0 & \dots \\ C_K & y_{K1t} & y_{K2t} & y_{K3t} & \dots & 0 \end{bmatrix} \quad (8)$$

第五步,估计城市市场分割指数。参考已有研究中市场分割指数是使用城市间价格变动的方差表示的做法,本文使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对价格变动矩阵赋权后取方差。为了消除量纲影响,赋权之前对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作和为 1 的行标准化处理。应用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矩阵与价格变动相乘求哈达玛积。

$$H_t = \Phi_{pt} \circ W_d \circ W_{yt} \quad (9)$$

那么,城市 i 的市场分割指数使用矩阵 H 第 i 行的非零元素的方差表征:

$$ms_{it} = \text{var}(H_{it}), i \neq j \quad (10)$$

第六步,测度市场一体化。城市市场分割指数表征城市与整体市场割裂的程度,其倒数可以反映城市融入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参考盛斌和毛其淋(2011)的做法,采用市场分割指数倒数的平方根表征市场一体化。城市 i 的市场一体化指数 MSI_{it} ,表示城市 i 融入区域一体化的程度。

$$MSI_{it} = \sqrt{1/ms_{it}} \quad (11)$$

交互项。为了进一步讨论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协同影响,本文引入了企业异地投资指数与城市市场一体化指数的交互项(fi_msi),反映二者的协同增长效应。

工具变量。考虑到模型设定过程中可能遗漏重要变量,以及由于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通过工具变量的方式来克服由此产生的估计结果偏误,以识别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工具变量回归的思路是找到外生的,且仅通过内生的解释变量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变量。Fishman 和 Svensson(2007)在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贿赂、税收与公司增长之间关系的工作中,论证了通过构造行业-地区层面变量的平均值作为企业层面该变量的工具变量有效性,并认为该处理方法可以有效解决由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

内生性问题。康志勇(2013)在研究融资约束、政府支持与中国本土企业研发投入问题时,使用了类似的工具变量构造法,效果好。就本文的分析对象而言,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的决策过程中必然受到其他城市的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而其他城市的企业异地投资情况难以直接影响本地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样的道理,其他城市市场一体化影响本地城市市场的一体化,而难以直接影响本地城市的经济增长。有鉴于此,本文使用其他城市的企业异地投资指数均值对数(lnafi)作为本地城市的企业异地投资的工具变量,使用其他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均值对数(lnamsi)作为本地城市市场一体化的工具变量。

控制变量。参考盛斌等(2011)、曹春方等(2019)、马光荣等(2020)的做法,本文选择一系列控制变量,并以对数形式引入模型,具体如下:劳动投入(lnem),使用年末单位从业人员表征,表示城市的人力资本资源投入;资本投入(lnfa),使用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征,表示城市的物质资源投入;要素禀赋(lnpd),反映城市的资源差异,使用人口密度表示;要素成本(lnaw),用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表示;发展政策(lnfe),代表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干预,使用财政支出表征;经济结构(sr),产业经济理论认为地区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使用第二产业占比表示经济结构的调整;信贷投入(lnlo),地区的金融环境发展情况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贷款总量表示;地区开放(lnfdi),对外开放往往吸引更多外资进入,获得更多的技术输入,本文使用实际外资使用量表征。

3. 数据说明与处理

本文选择扩容后的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异地设立子公司的数据可得性,将研究期间设定为2010-2018年。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国研网的区域经济数据库,缺失数据从相应省份和城市的统计年鉴以及统计公报中手工整理或计算补齐。

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及其异地投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的公司研究数据中的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和上市公司子公司基本情况两个统计表。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包括统计年度、证券代码、公司名称、行业代码和注册地址等基本信息等。上市公司子公司情况表主要包括统计年度、证券代码、子公司名称和注册地址等基本信息。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异地投资数据集的清洗和构建具体过程如下:根据上市公司基本信息,筛选出注册地为长三角地区的样本数据;按照行业代码,进一步筛选出制造业企业;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与上市公司子公司数据表按照统计年度和证券代码匹配;识别出子公司注册地在长三角范围内的样本数据。由于子公司原始数据大部分地址并不是在城市层面,因此需要手工整理。而对于地址信息不明或者缺失的样本,通过百度查询公司详细信息,并手工补充完整。

城市的各项经济指标主要来源于国研网的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城市层面数据,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手工方式,从省份、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中获取基础数据,经过计算获得。应用GDP平减指数,以2010年为基期剔除价格效应。此外,通过高德地图开放平台,根据城市的市政府所在地,获取城市的经纬度,并应用航海距离测算常用的大圆距离公式估计得到城市间距离。各个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d	min	max
g	369	0.0971	0.026	-0.004	0.182
lngy	369	11.75	1.334	5.161	13.79
lnfi	369	3.079	1.115	0	6.544
lnafi	369	3.079	0.512	2.241	3.933

lnmsi	369	11.50	0.387	10.50	12.55
lnamsi	369	11.50	0.217	11.17	11.95
fi_msi	369	35.47	13.13	0	80.54
lnem	369	3.975	0.950	1.960	6.594
lnfa	369	11.59	0.939	3.341	13.18
lnpd	369	6.363	0.526	4.979	7.743
lnaw	369	185	106.7	1	369
lnfe	369	9.874	1.155	3.497	12.24
sr	369	48.86	7.339	29.80	74.73
lnlo	369	12.04	1.155	9.867	15.86
lnfdi	369	6.322	1.249	3.625	9.582

四、实证结果

1. 基本估计结果

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模型存在内生解释变量,且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约束。2SLS 模型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约束要求。表 2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满足相关性要求;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满足排他性约束。进一步看,在基本模型估计中,DWH(Durbin-Wu-Hausman)值都较大,P 值都在 1%水平上拒绝解释变量外生,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说明本文设定工具变量有效;KRF(Kleibergen-Paap rk Wald Fstatistic)统计量显著大于通用的判断临界值 10,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2 2SLS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lnfi		lnmsi	
		(1)	(2)	(3)	(4)
工具变量	lnafi	0.994*** (36.96)	1.021*** (18.72)		
	lnamsi			0.973*** (16.75)	0.957*** (11.73)

(续表)

变量	lnfi		lnmsi	
	(1)	(2)	(3)	(4)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Ftest	127.67***	28.96***	8.90***	5.78***
样本量	369	369	369	369

列(1)–(3)分别报告了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逐步引入解释变量回归的结果。列(1)引入企业异地投资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企业异地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列(2)引入市场一体化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市场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列(3)同时引入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两个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且相较于单一因素的考察系数都变大了,表明二者都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本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城市的地区总产出水平值替换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采用相同的模型设置和逐步引入变量策略,得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 1,在替换了经济增长的表征指标后,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以及二者的交互项的系数虽然变大,但依然显著,都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表现保持一致。因此,总的来说,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五、异质性分析

1. 时期异质性

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期为 2016–2020),第一次将长三角地区覆盖到“三省一市”区域,可以看作最新的长三角一体化纲要的雏形版本。由此,本文将观测样本时间分为 2010–2015 年和 2016–2018 年两个时期,考察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在不同时期的增长效应特征差异,并对相应的政策作出初步的评价。

分时段回归结果见第 1 列和第 2 列。结果表明,两个时间段的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以及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相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比较两个时段的系数大小发现:在政策发布后,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以及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都变大了,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放大了二者的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剧了二者的替代效应。

2. 区位异质性

规划纲要将长三角区域城市分为中心区城市 2 和非中心区城市,形成了政策性中心–外围格局。据此,本文进一步从中心地区城市和外围地区城市分别考察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

区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见第3列和第4列。结果表明,中心地区城市群的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以及二者交互效应表现出与全样本的基本模型估计相一致的特征。但是外围城市的企业异地投资抑制了城市经济增长,表明产生了虹吸现象,即由于市场分割,异地企业的进入,产生了竞争挤出效应,会负向冲击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市场一体化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是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的交互作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表明二者协同促进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

六、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区域一体化影响因素研究逐渐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而企业作为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主体,其动态行为无疑是市场一体化的微观运行关键机制之一。企业异地投资是企业动态行为的常见形式,通过在异地设立子公司或者参股并购,以跨越市场壁垒,运用企业组织替代市场交易,从而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客观上促进了市场一体化,产生了增长效应。本文借鉴企业异地投资指数的测度方法,并提出了市场分割测度的价格权重法,基于2010-2018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层面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微观数据,以及经济增长、资源禀赋、开放水平等城市经济指标,考察了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以及二者交互项的增长效应。通过基准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全样本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都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而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之间存在替代效应。②时期异质性的分析结果表明,政策颁布前,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及其交互项所产生的增长效应依然与全样本估计结果表现出一致的特征,但是政策颁布后的增长效应明显变大,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显著放大各个因素的增长效应。③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心地区城市群与区域整体表现一致,而外围城市群存在虹吸现象,有可能加剧区域不平衡。但在外围城市群,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的交互作用,并未产生替代效应,反而能够相互协同,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2. 政策启示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如何扮演好中国经济增长的示范和驱动角色,除了关注宏观因素、顶层设计、城市群和产业等因素之外,亟需从微观层面展开深刻探索,夯实区域一体化的微观基础,为更大范围的均衡和区域一体化创造条件,并为完善一体化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是重视企业异地投资,完善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的内生性机制。企业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行为有利于突破市场分割,在更广的地理空间上整合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因此,需要着力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在区域内自由进出扫清障碍,以发挥市场一体化的企业动态内生驱动力,依靠市场力量驱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二是抑制企业异地投资与市场一体化的替代效应。在鼓励企业发展和异地投资的同时,需要关注异地企业进入对本地存量企业的冲击,减缓企业进入产生的替代效应,最大限度实现企业进入促进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三是优化长三角区域内城市群划分政策。中心-外围的不均衡发展格局显然与长三角一体化的总体目标是不相容的。经验证据表明,外围城市并未能从企业异地投资和市场一体化得到最大收益,相反却存在虹吸效应。中心外围城市群划分政策需要作出适当的调整,协调整个区域所有城市的功能地位与分工,实现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 Baier, S. L., and J. H. Bergstr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4(1): 29-63.
- [2]. Murata, Y., and J. F. Thisse. A Simple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 à la Helpman-Tabuchi.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58(1): 137-155.
- [3]. Poncet, S.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1): 1-21.

-
- [4]. Fishman, R., and J. Svensson.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1): 63-75.
- [5]. 李培鑫、张学良:《长三角空间结构特征及空间一体化发展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 [6]. 刘志彪、徐宁:《统一市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的使命、任务与措施》,《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7期。
- [7]. 董洪超、蒋伏心:《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20年第5期。
- [8]. 刘乃全、吴友:《长三角扩容能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增长吗》,《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
- [9]. 邓文博、宋宇、陈晓雪:《区域一体化带动长三角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效应评估——基于 DID 模型的实证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9年第7期。
- [10]. 强永昌、杨航英:《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扩容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 [11]. 项松林:《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当代经济科学》2015年第5期。
- [12]. 张子珍:《基于企业区位选址的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经济问题》2017年第5期。
- [13]. 嵇正龙、宋宇:《产业空间集聚中心引力指数算法的设计及应用——基于长三角一体化视角的企业微观数据验证》,《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年第3期。
- [14]. 李鲁:《民营经济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历程与互动机制》,《治理研究》2019年第5期。
- [15]. 刘志彪、陈柳:《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价值与动力机制》,《改革》2018年第12期。
- [16]. 曹春方、夏常源、钱先航:《地区间信任与集团异地发展——基于企业边界理论的实证检验》,《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
- [17]. 贾佳、刘小元:《政治关联、异地投资经验与异地子公司进入模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 [18]. 张筱娟、徐维祥等:《制造业企业的迁移特征、机制及其绩效——以杭州市为例》,《经济地理》2019年第6期。
- [19]. 盛斌、毛其淋:《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世界经济》2011年第11期。
- [20]. 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 [21]. 曹春方、周大伟等:《市场分割与异地子公司分布》,《管理世界》2015年第9期。
- [22]. 马光荣、程小萌、杨恩艳:《交通基础设施如何促进资本流动——基于高铁开通和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中国

工业经济》2020 年第 6 期。

[23]. 康志勇:《融资约束、政府支持与中国本土企业研发投入》,《南开管理评论》2013 年第 5 期。

[24]. 刘志彪、孔令池:《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特征、问题及基本策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

注释:

1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出,备索。

2 以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7 个城市为中心区城市群。